

**“CORPORATE AC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 **“法人行动” 与当代中国社会**

**翟丽宏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CORPORATE AC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 **“法人行动” 与当代中国社会**

**翟丽宏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法人行动”与当代中国社会/翟丽宏著.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08-7992-4

I. ①法… II. ①翟… III. ①社会学-研究-中国-  
现代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0272 号

---

责任编辑:侯 萍

责任印制:张军利

---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蔡 颢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022)23332400(编辑部) 23332393(发行部)

网址:www.tjkjcs.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亚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10×1 00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50 00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 前 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表现出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上,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开始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理论分化进行反思,并且逐渐意识到,帕森斯之后出现的许多理论都无法单独解释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于是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对原有各种理论的分析 and 批判,并试图在吸收、借鉴各种理论优点的基础上构造出新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关注着日益复杂的社会变迁和人类生活的前途。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都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理论家,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 S·科尔曼(James Samule. Coleman)也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理性选择理论流派的领航者,科尔曼对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他对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表现在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人行动”的概念,建立了以理性行动为基础,以“法人行动”为最大亮点,完整而又独特的“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

这里所说的“法人(corporate)”,并不是当代法学理论和法学实践意义上的“法人”,而是科尔曼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特定概念,也有人称之为“法团”“团体组织”等。“法人行动(corporate action)”是科尔曼提出的一个理论观点,其主要内容是,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革就是“法人行动者(corporate actors)”的大量崛起。所谓“法人行动者”,指的是自然人行动者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与其他行动者在“委托—代理”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行动单位”,它以各类社会组织的形式出现,同自然人一样拥有一定的资源和目标,并且通过理性选择的过程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简单地说,“法人行动者”就是以各类组织形式存在

的理性社会行动者。也有人认为应将“corporate action”译为“团体行动”更加妥当一些。鉴于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是“法人行动”，本书亦将沿用这种称法。事实上，科尔曼“法人行动者”的内涵要比通常法学意义上的“法人”更加宽泛。

科尔曼认为，“法人行动者”已经和自然人一起成为社会中的基本行动者，于是，在现代社会行动结构中，既有作为自然人的行动者，也有作为法人代理人的行动者和作为行动主体的“法人行动者”，所有的行动者均以理性选择为其行动指导，希望在对“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中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行动和社会互动的格局更为复杂，许多社会问题也因此而产生。

科尔曼的“法人行动”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社会实践意义，它既是一种社会行动理论，又是一种组织理论，同时还可以纳入社会变迁的理论范畴。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理论，“法人行动”扩充了行动者的类型，认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行动者由自然人和一部分法人共同构成，在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上也试图弥合微观行动命题与宏观社会理论之间的固有鸿沟；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法人行动”从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为组织管理、组织控制、组织生存和组织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框架和研究思路；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法人行动”密切关注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表达了深刻的洞见和强烈的使命感。

对中国社会而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变迁问题，都成为众多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面对复杂的社会转型和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更加宽泛和多元化的理论视角，而法人行动丰富的理论内涵、大尺度的结构纵深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本书就是这种思路之下的一次探索和尝试。

本书分上、下篇两个部分。上篇部分对科尔曼“法人行动”思想的理论内涵和社会实践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从三个理论层面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剖析：（1）在“社会行动”这一理论层面，“法人行动”扩充了行动者的类型，认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行动者由自然人和一部分法人组织共同构成，在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上，“法人行动”也试图弥合微观行动与宏观社会之间的固有鸿沟。（2）在“组

织研究”这一理论层面,“法人行动”所涉及的组织研究的领域尽管比较有限,但它强调各个职位代理人的“双重资源”,强调组织中行动各方的资源、利益和理性选择的过程,这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可以为当前组织管理、组织控制以及组织生存和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3)在“社会结构变迁”这一理论层面,科尔曼密切关注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提示人们关注“法人行动”对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强调控制“法人行动”、重建社会资本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本书的下篇部分从上述三个不同的理论层面(即社会行动、组织研究和社会结构变迁三个层面)考察了当代中国社会行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认为:(1)传统中国社会的家族、封建官僚组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单位”组织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人行动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组织不断演变和分化,具有“法人行动者”特征的社会组织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本书将这些组织划分为“市场型”、“政府型”和“民间公益型”三种类型,并对其社会行动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2)就“组织研究”而言,当前我国各类“法人行动者”中存在一系列管理、控制与决策等问题,“法人行动”的理论视角可以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例如,代理人的双重资源问题可以使我们对腐败形成的根源有一个独特的认识;以利益为核心的理性选择过程则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组织决策与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断开拓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3)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的影响,“法人行动”在整个社会行动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在这种形势之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如“法人行动者”对自然人和公共环境利益的侵害,社会对“法人行动者”的管理与控制以及原始“社会资本”的缺失给一些弱势群体带来的损害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科尔曼提出的重建“社会资本”的思路可以为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对此应时刻保持清醒,避免陷入理论“扩张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社会学理论体系日臻完善的今天,任何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只要能为人们的社会理解和社会实践带来一些新的启发,那么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

# 目 录

## 上篇 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

### 导 论 3

- 一 “法人行动”及其研究空间 3
- 二 争论:理性选择能否促成社会理论的新综合 4
- 三 认可与质疑:对科尔曼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的评价 17
- 四 有限的关注:对科尔曼“法人行动”的研究 20
- 五 本次研究的基本设想 23

### 第一章 科尔曼及其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 27

- 一 科尔曼的生平与学术经历 27
- 二 科尔曼的学术特点与思想渊源 32
- 三 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 36

### 第二章 新型社会行动单位:社会行动理论视野中的“法人行动” 44

- 一 社会行动: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44
- 二 “法人行动者”:社会行动理论的一个创新概念 48
- 三 自然人与法人:基本行动者含义的扩充 53
- 四 “法人行动”:形成机制与行动的内涵 56
- 五 组织理性:“法人行动”的理论基点 59

### 第三章 利益的权衡与调控:组织研究视野中的“法人行动” 64

- 一 “法人行动”与组织理论研究 64

- 二 对代理人的控制:组织控制的重要问题 67
- 三 组织决策与社会选择 72
- 四 法人生存:一个组织生存问题 74
- 五 网络组织:新型“法人行动者” 76

#### 第四章 结构失调与社会重建: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中的“法人行动” 85

- 一 当代社会结构变迁及相应的理论进展 85
- 二 “法人行动”与社会变迁:科尔曼的阐释 89
- 三 “法人行动”的社会控制 98

### 下篇 当代中国社会“法人行动”

#### 第五章 “法人行动”与当代中国社会行动:必然的转型 111

- 一 传统中国社会行动:个人、家族与“单位” 111
- 二 经济利益导向:转型期社会个体行动价值观的变化 117
- 三 “法人行动”:转型期社会行动发展趋势 121

#### 第六章 当代中国“法人行动者”:类型分析 126

- 一 市场型“法人行动者” 126
- 二 政府型“法人行动者” 133
- 三 民间公益型“法人行动者” 139
- 四 当前我国农村组织的发展与“法人行动” 143

#### 第七章 “法人行动”与当代中国组织研究 147

- 一 腐败及其治理:一个组织控制问题 147
- 二 组织决策问题 155
- 三 当代中国组织生存与发展问题 159

#### 第八章 “法人行动”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 167

- 一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理论进展 167
- 二 “法人行动者”的大量崛起 172
- 三 “法人行动”与社会问题 177

四 当前我国“法人行动者”的管理与控制 184

五 重建“社会资本” 190

结语 196

参考文献 199

附录:调查问卷 212

后记 214

# 上 篇

---

## 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



# 导 论

## 一 “法人行动”及其研究空间

科尔曼法人行动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与以往相比,现代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革,那就是“法人行动者(corporate actors)”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崛起,并且有相当多的法人组织已经和自然人一起成为社会中的基本行动者。在现代社会行动者结构中,既有作为自然人的行动者,也有作为法人代理人的行动者和作为行动主体的法人行动者,所有的行动者均以理性选择为其行动指导,希望在对“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中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行动和互动的格局更为复杂,许多社会问题也因此而产生。

法人行动理论是科尔曼理性社会行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了它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矛盾和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该理论对当代社会学理论、组织社会学、社会政策等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对科尔曼的学术成果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科尔曼“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sup>①</sup>

我们看到,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变迁,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在不断调整,社会学研究者正在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和追踪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我们也可以尝试将“法人行动”理论引入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实践,从社会行动、组织研究和社会结构变迁三个理论层面、以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

<sup>①</sup>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封页。

科尔曼“法人行动”理论的产生与西方发达社会的现实环境和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连,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变迁环境中,该理论有可能会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其解释力也可能会受到某些方面的局限,考察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法人行动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改进,而且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整体创新提供有益的动力。

到目前为止,在国内社会学界还没有看到对“法人行动”理论的专项、系统研究,已有的研究焦点大多集中在科尔曼理论体系的基础,即“理性行动论”这一部分,还有一些就是对“法人行动”概念和分析框架的零散应用。因此,可以考虑将“法人行动”纳入社会行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加强对该理论的系统分析和深入思考,充分挖掘其中富有创新意义和启发作用的内容。结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可以预见法人行动理论的研究空间十分广阔,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次研究的选题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孕育而生的。

## 二 争论:理性选择能否促成社会理论的新综合

在当代社会学领域,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RCT)是人们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方向。科尔曼的理论体系是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领域内的最新发展,科尔曼本人也被看作芝加哥大学理性选择阵营的三员猛将之一,另外两位是经济学及社会学教授加利·贝克尔(Gary Becker)和政治科学及哲学教授琼·艾斯特(Jon Elster)。<sup>①</sup>可以说,科尔曼对个体行动的研究以及整个社会行动理论的建立都是以理性选择论为基本出发点的,而“法人行动”也是科尔曼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有关理性选择的研究和争论无一例外都与科尔曼的理论体系以及法人行动密切相关,如果要研究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首先必须了解学术界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

理性选择理论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其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的、有选择的行动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它的具体假设是:“第一,

---

<sup>①</sup> 陆德泉,《记海德园的理性选择论战》,《信报》,1993年10月26日,下载自 [http://iculture.ichannel.com.hk/HA/HA10/HA10\\_008.html](http://iculture.ichannel.com.hk/HA/HA10/HA10_008.html).

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sup>①</sup>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不同的物品，不同的行动方案对行动者来说具有不同的“效益”，也就是说，一个理性的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因此，这种理论观点同时也可以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社会学等经济学以外的学科领域内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些新的学说和流派，并一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中，都常常会为一些稀有的资源而竞争，这是理性选择理论最终在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中得到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主要背景。在理性选择论“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首先提到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努力，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歧视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理论在非经济领域运用的早期例证，他在人力资源、犯罪学、家庭等方面的研究中也广泛地应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受贝克尔的影响，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在贝克尔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地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罗伯特·弗朗克(Robert Frank)在“选择权力”一文中分析了涉及个人择业的社会系统，他指出，一个人选择工作时不仅仅考虑自己工资的多少，而且还考虑与同一公司中其他同事工资对比的情况。<sup>②</sup>

关于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扩展，还要特别提到的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在其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芝加哥大学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部在20世纪80年代将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其致力推动的研究方向，它成立了一个跨学科的学术委员会，集合了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科学等各学科的仁人志士来推动理解理性、道德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从而在建立理性选择的理论纲领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sup>③</sup>随着《理性与社会》期刊的出版和1990年国际社会学协会(ISA)理性选择研究分会的诞生，理性选择理论完全确立起了自己的学术

① 丘海雄、张应祥：《理性选择理论述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18页。

② 转引自周长城：《理性选择理论》，《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侯钧生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9页。

③ 陆德泉：《记海德园的理性选择论战》，《信报》，1993年10月26日，下载自[http://iculture.ichannel.com.hk/HA/HA10/HA10\\_008.html](http://iculture.ichannel.com.hk/HA/HA10/HA10_008.html)。

地位。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对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重新说明,它试图解释的是,在各类行动者有目的的、以自身偏好为取向的行动之下,社会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正如科尔曼所指出的,其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社会作为两种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个人行动系统和社会行动系统),怎样共存”。<sup>①</sup>显然,理性选择理论者认为,已有的社会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尤其忽视了从行动者的性质和关系上解释社会系统的产生过程。

理性选择理论在其向外“扩张”的早期曾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因为它关于社会行动者的极端理性主义假设过于片面,忽视了经验世界的真实性以及价值、信仰等系统的作用,带有严重的微观决定论倾向。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学理论取得的成功,一些理性选择论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美国,分析哲学和经济计量学的发展为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形式逻辑、数学模型及计量方法的基础,使其在80年代后期大发异彩,许多青年学者都趋之若鹜。

不过,国际学术界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从未停止过。在大部分社会学家看来,由于种种原因,纯粹的理性选择似乎很难完全实现,比如,价值、传统与习俗会影响“偏好”的等级次序;情感、认知等心理学因素会持续性地改变人们的偏好;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会影响他们对成本与报酬的认识。<sup>②</sup>具体来看,关于理性选择,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对理性选择基本假设的争论

对理性选择基本假设的争论集中于“是否所有人类行为都是理性行为、并且都可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这个问题。“理性”本来是西方哲学史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正如美国当代哲学家布兰夏德所说:“对理性的信仰在广泛意义上说是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决定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sup>③</sup>然而,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理性”这一概念运用得极为广泛,并赋予了它不同的理论内涵。长期以来,关于理性的歧义有很多,“理性”本身也成为复杂的多层次概念,“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进行

①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页。

② [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07页。

③ 杨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论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9页。

分析就会有不同的定义”,<sup>①</sup>从而也就有了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理解。从本体论角度讲,理性以柏拉图的宇宙理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为代表,试图探索世界的本原和宇宙的本质,认为本体理性是绝对的确定性和完满性,在这个意义上,不确定的、不完满的东西就是非理性的;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理性是指人们借以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和抽象思维能力,在这个意义上,非理性指的是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思维过程与认识水平;从价值论的角度讲,理性强调的是一种合理的价值理想目标和价值评判标准,在这个意义上,非理性指价值目标与评价标准上的不合理行为;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理性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性的工具和手段,即所谓的“方法理性”或“工具理性”,在这个意义上,非理性是指行动的工具与手段的缺乏客观性与科学性。对理性概念的不同认识是许多矛盾和争论的最基本的根源,事实上,要讨论某种行为是否理性,首先就应对理性这一概念的认知取得一致,否则就无法进行对话,所有的争论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所谓的“理性”主要源于经济学的解释和界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庞大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前提,这就是经济人和理性行为,其核心因素是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即有序的偏好)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内涵接近于人们常说的“工具理性”。在正统的经济学中,经济人和理性行为这两个假设被用于分析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在这里,完全理性和最大化的假设互为条件,一方面,只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理性行为;另一方面,人只有具备完全理性才能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即人只有具备完全理性才能够找到那些所有的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且通过衡量作出最优的判断和选择。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行为似乎要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这种行为假设复杂得多。例如,人的行动“偏好”并非固定不变,而且存在许多非理性的动机,其行动目的也并非仅仅追求利益最大化等。

针对古典假设的缺陷,当代经济学家做了许多改进和弥补的工作。赫伯特·西蒙(Simon, H. A.)认为,传统经济理论所假定的“经济人”拥有丰富的知识、稳定的偏好体系和相当条理的计算能力,而这些条件在社会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人们在现实社会行动过程中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无法按照

---

<sup>①</sup> 黄南珊:《西方理性概念内涵分析》,《晋阳学刊》,1995年第1期,第69—74页。

充分理性的原则去采取行动,无法在决策中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具体来说,首先,人们决策时通常并不考虑所有的方案,而只是考虑其中的一部分方案;其次,人们在决策时并不像传统理性选择模式所说的那样同时比较不同的方案,而是按循序成对的方式进行比较,即将两个选择加以比较选出一个,然后在与下一个选择方案进行比较,这种双双重复比较明显不同于所有方案同时比较,其结果并不一定能保证效益最大化;再次,人们在社会行动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用西蒙自己的话来说,“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sup>①</sup>。阿罗(Kenneth Arrow)也强调了这种所谓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sup>②</sup> 尽管“有限理性”的基本思想也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但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不能将它模式化,因此在许多研究中,“有限理性”的思想仍然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除了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以外,针对理性选择所受到的质疑和批判,经济学家还采取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应对策略,例如有一种辩解是,尽管人类的一些行动不能用传统理性选择的框架进行解释,但是,人类的绝大部分行为都会对经济机会作出反应,都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不管这种行为的初始动机是理性抑或非理性。例如,在美国,经常有圣诞礼物基金一类的组织,参加者每月存入固定数额的钱,不计利息,到圣诞前取出累积本金或等值的礼物。有人认为,这种有钱不存在银行得利息的行为很明显是非理性和不经济的,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很难对此做出解释。对此,一些经济学家的回答是,这些复杂的文化行为和心理动机应由社会学、心理学等去研究,而经济学关心的是,给定人们的原始动机,如果经济机会发生变动,人们的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变化? 比如,利率的提高是否会影响人们存进礼物基金的金额? 其变动的幅度有多大? 再如,个人收入的增加或减少对人们存放礼物基金的行为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此等等。<sup>③</sup> 不过,这一类的反驳终究有些“底气不足”,似乎已经有“负隅顽抗”的味道,大多数理性选择的支持者还是“理性地”选择了适当地退步,即将理性选择的条件放宽,承认有限理性,并将

① 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75页。

②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③ 王亚锋:《爱情经济学》,经济学家网,2002年11月23日,下载自 [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asp?eyno=335](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asp?eyno=335)。